

20世纪以来两周青铜礼器研究综述

Generlization of Zhou Dynasties Ceremonial Bronze Studies after 20th Century

董 睿

Dong Rui

(河南大学艺术学院, 开封, 475001)

(Art College of Henan University, Kaifeng, 475001)

内容提要: 两周青铜器是中国青铜器发展由盛至衰的转型阶段, 20世纪以来国内外学者从青铜器分期断代、区系类型、铸造工艺、礼制、器主身份考证等方面入手, 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果; 但是推进两周青铜器的研究, 仍需从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和研究思路方面深入拓展。

关键词: 青铜器 中原地区 礼制转型

Abstract: Zhou Dynasty is the turning point of China bronzes history, from prosperity to declination. Since 20th century, scholars from China and worldwide gain academic results in terms of staging, regional differences, techniques, ceremonial meaning, user identity. However, to deeper research Zhou Dynasty bronzes, more work should be done on research objects, methods and ideas.

Key Words: Bronze; middle-land region; changes of ceremonial system

中国青铜时代肇始于二里头文化, 在春秋晚期走向衰落, 至少持续1500年之久。礼器是举行礼仪活动时所使用的器物, 是青铜器中最重要的部分。自20世纪以来, 随着考古学的兴起和青铜器出土数量的增多, 全世界学者对中国青铜器均给予了极大的关注, 形成了一系列的研究方法和大量研究成果。本文拟在对两周青铜器研究成果进行系统梳理的基础上, 归纳成果, 总结不足, 希望能够引起学术界关于如何继续推进两周青铜器研究的思考。

一、西周青铜礼器研究综述

1. 分期断代研究

这是三代青铜器研究的核心问题, 主要运用考古学、考古类型学等方法按照器物的组合、形制进行分期断代, 考证铭文对应的年代范围等。1924年王国维在《王子婴次炉跋》中通过对新郑郑公大墓出土铜炉铭文的分析, 认为“新郑之墓当葬于鲁成公十六年(前575年)鄢陵战役后, 乃成公以下之坟墓矣”^[1]。1928年郭沫若旅居日本时所著《两周金

文辞大系图录考释》，创立了以铭文自书年代的器物作为标准器的“标准器断代法”，并结合青铜器器形、花纹、文字（包括文体和字体）为基础建立了青铜器分期断代框架，将中国青铜器的发展分为四期：滥觞期（相当于殷商前期）、勃古期（殷商后期至西周昭、穆王）、开放期（西周恭、懿王至春秋中叶）、新式期（春秋中叶至战国末年）^[2]。1929年吴其昌在《金文历朔疏证》一书中依据青铜器铭文上的历法进行分期和断代研究，即“历朔断代法”^[3]。1936年瑞典学者高本汉（Klas Bernhard Johannes Karlgren）在《中国铜器上的殷周时代》中提出要根据商周器铭内容的不同来区分商周铜器，他将殷周时代青铜器分为殷、殷周、中周、淮式四期^[4]。1956年陈梦家对青铜器形制和纹饰进行类型学分析，将西周青铜器划分为初中晚三期，即武王至昭王为初期、穆王至夷王为中期，厉王至幽王为晚期，并据铭文将332件青铜器归入具体所属周王的时代范围内，对西周青铜器断代研究做了重要发展^[5]。1962年，日本学者樋口龙康在《西周铜器之研究》中，以新出土的西周铜器为主要资料，根据铭文的内在联系与器形的比较，将相类的器物集中在一起，设定编年组，在同一组内依靠与中心器（实即标准器）关系之远近来排列年代先后，将西周青铜器分为初、中、后三期^[6]。1965年郭宝钧将西安普渡村铜器群作为西周中期的标准器，以周穆王为界，将西周青铜器分为前后两期，指出前期风格为晚殷铸造的延续，后期开始展现周人风格^[7]。1962年唐兰在《西周青铜器断代的“康宫”问题》系统阐述了西周青铜器铭文中的“康宫”原则，认为“康宫”是周康王的宗庙，凡是铭文中出现“康宫”字样的器物，必制作于西周康王之后，这是西周青铜器断代研究中一个极为重要的新论断^[8]。1979年李学勤在《西周中期青铜器的重要标尺——周原庄白、强家两处青铜器窖藏的综合研究》中，认为庄白1号窖藏器物铭文包含了微氏家族四到七世的事迹，时代从周昭王到周厉王，对西周青铜器断代具有标尺性意义^[9]。1982年杜迺松在《青铜器的分期与断代》中，以周恭王为界将西周青铜器分为前后两期，指

出西周前期的铜器与商晚期一样厚重庄严，后期则多注重记事铭文而不注意外表的装饰^[10]。1983年容庚在《殷周青铜器通论》中将商周铜器分为商、西周前期、西周后期、春秋战国四期^[11]。1986年唐兰在《西周青铜器铭文分代史征》中，根据铭文将西周的280件青铜器归属到西周武王到宣王的时代范围内^[12]。1999年王世民、陈公柔、张长寿在《西周青铜器分期断代研究》中，选取西周青铜器铭文中历谱完备的352件器物，根据形制和纹饰分为早中晚三期，即武王到昭王、穆王到夷王、厉王至幽王^[13]。2005年张懋镕在《西周青铜器断代两系说刍议》中，对以前学者按照周王序列断代的方法进行了反思，提出了西周铜器断代的新思路，他认为西周铜器大致可分为器主以殷遗民为代表的商系统和以姬周贵族为代表的周系统，商系统的基本特点是保守，而周系统则是创新，从商系统向周系统转变的完成在西周中期^[14]。2009年朱凤瀚将西周青铜器分为五期，武王至成王为第一期，康王至昭王为第二期，穆王至共王为第三期，懿王至夷王为第四期，厉王至幽王为第五期，认为第一期器形与殷代晚期接近，纹饰华丽；二、三期器形向低矮发展，纹饰注重素朴庄重之风；四、五期主要的食、酒器均在形体上出现新的构造^[15]。

2. 装饰纹样研究

纹饰和铭文不仅是对青铜器进行分期断代的凭证，纹饰和铭文自身也是重要的研究对象，该项研究继承了宋代金石学和清代考据学的传统，通过铭文判断墓主人身份，探讨纹饰的演变和意义等问题。1936年高本汉利用语言学方法将殷周青铜器的铭文和纹饰区分开来，他认为殷代青铜器铭文字数少而含有人的名字，字形原始，器物装饰繁缛，饕餮纹居多，而周代青铜器新的形式在公元前10世纪中叶才开始出现，铭文字数多，器身纹饰抽象化而不易辨识^[16]。1957年英国学者康斯腾（Eleanor von Erdberg Consten）将青铜器纹饰分为鬼神、象征性动物和抽象符号三类^[17]。1981年张光直在《商周青铜器上的动物纹样》中认为商周青铜器的动物纹样

是协助巫觋沟通天地神人的各种动物形象^[18]。1984年刘敦愿在《青铜器装饰纹样的起源与母题研究》中对商周青铜器饕餮纹的名称提出质疑,认为这种纹样起源于人们对于兽类的深入观察与有关崇拜,并以此用来避祸求福,应命名为兽面纹^[19]。1984年和1990年陈公柔、张长寿在《殷周青铜器上鸟纹的断代研究》和《殷周青铜器上兽面纹的断代研究》中分别对青铜器鸟纹和兽面纹进行了研究,认为青铜器上的鸟纹出现于殷商时期,没落在西周中期以后,青铜容器上的兽面纹可能出现于二里冈时期,西周中期向窃曲纹转化并逐渐消失^[20]。1990年英国学者杰西卡·罗森(Jessica Rawson)认为西周中期的青铜器最明显的变化是周式风格装饰艺术日益成熟,各种类型的华丽鸟纹被装点青铜器的突出位置,兽面纹装饰逐渐衰退^[21]。2005年杨晓能在《商周青铜器纹饰和图形文字的含义及功能》中,认为青铜器纹饰实际上是“泛神动物”崇拜的概括式图像,商代青铜器装饰以动物纹样为主,西周时被抽象肢解为几何图案,青铜礼器的功能由沟通上帝与神灵和世人之间的媒介转换为社会等级的象征^[22]。

3. 区系类型研究

区系是对青铜器分布区域的划分,类型是对器物形制演变的探讨。1946年陈梦家在《中国铜器概述》中将东周列国青铜器划分为东土、西土、南土、北土、中土五系,试图探讨各系之间的文化系统等因素^[23]。1989年高崇文在《两周时期铜壶的形态学研究》中认为西周时首先在宗周地区产生并流行方壶和圆壶,东周时出现若干分支,地区性差异逐渐形成^[24]。2003年张懋镠在《两周青铜盨研究》中认为铜盨流行在西周中晚期,是周人重食文化的产物^[25]。2004年高西省在《西周铜壶研究》中指出西周青铜壶纹饰早期质朴晚期繁缛,该变化与其他青铜礼器纹饰的变化风格正好相反^[26]。

4. 铸造工艺研究

通过铸造工艺的研究,分析器物的文化属性、技术来源,以及技术水平等问题。1933年日本梅原

末治在《殷周的考古学的研究》中对宝鸡斗鸡台出土的包括铜禁在内的一批青铜器从考古器型学的角度进行分析,指出了这批器物在器型和制作手法上的差异,指出这批器物年代非属同时,其聚合在一起当有一个复杂的过程^[27]。1935年瑞典学者卡尔贝克(Orvar Karlbeck)对安阳出土的商代青铜器陶范进行了物理、化学和可铸性考察,并模拟进行了块范组合铸造的实验^[28]。20世纪60年代,澳大利亚学者巴纳德(Noel Barnard)指出中国青铜器铸造技术是由中国本土发展形成^[29]。2014年苏荣誉《青铜工艺与青铜风格、年代与产地——论商末周初的牛首饰青铜四耳簋和出戟饰青铜器》认为宝鸡戴家湾、石鼓山以及纸坊头青铜器中的一些特殊器物,其风格和技术均属于商代南方风格的器物^[30]。

5. 礼制和文化研究

通过青铜器组合探讨两周的青铜礼制,通过器物形制和铭文解决两周历史问题,是继青铜器分期断代研究之后又一热点问题。1978年俞伟超、高明在《周代用鼎制度研究(中)》中将文献材料与考古出土器物相结合,厘清了文献如何与周代的用鼎制度对应的问题,认为懿孝时期是西周礼制的重要转折阶段,西周前期形成了完整的用鼎制度,懿、孝以后进入到逐步破坏阶段^[31]。1987年杨宽在《西周史》中认为以奇数为等次的列鼎制度在西周初期已经开始推行,西周中期得以确立,直到春秋战国,贵族墓葬仍然长期流行列鼎制度^[32]。1993年巫鸿在《中国古代艺术与建筑中的“纪念碑性”》中强调西周青铜器的主要意义不再是礼仪中与神明沟通的工具,更多地成为展示生者现世荣耀和成就的物证,这样的青铜器要求的是被“阅读”而不是被“观看”^[33]。2007年李峰在《西周的灭亡:中国早期国家的地理和政治危机》中通过对青铜器及铭文的分析,认为周王室与地方封国之间的交流在西周早期时有发生,但到西周中期则逐渐中断^[34]。2010年李峰在《西周的政体:中国早期的官僚制度和国家》中,通过西周金文深入探讨西周政府的行政制度及运行特点,认为周代是姓氏制度产生的时期,

自西周中期开始,政府结构的区隔化以及政府运行的系统化等一系列迹象开始清楚地显现出来^[35]。2015年高崇文在《江汉地区青铜礼制文化的发展与传播》中指出,江汉地区在商时期就已经受到中原商系青铜文化的强烈影响,西周时期周系青铜礼制文化成为该地区的主流^[36]。2016年杨文胜在《中原地区两周随葬青铜礼乐器制度研究》中认为西周中晚期乐器编钟仅随葬于诸侯级男性贵族墓葬中,春秋中期作为卿大夫配偶的女性贵族也拥有了随葬乐器的权利^[37]。

二、东周青铜礼器研究综述

1. 区系类型研究

通过对青铜器形制、组合、造型等的分析,归纳青铜器的文化属性、区域类型等问题,探讨不同区域之间的技术文化传播与交流等问题。1981年高明在《中原地区东周时代青铜礼器研究》中认为中原地区的东周礼器组合各个阶段内有其固定内容,且器形变化频繁,花纹变化迟缓^[38]。1983年高崇文在《东周楚式鼎形态分析》中认为春秋初期楚式鼎吸收了中原和汉淮间诸国文化的特征,春秋中期形成了较为独特的青铜文化体系^[39]。2005年杨式昭在《春秋楚系青铜器转型风格之研究》中认为郑公大墓青铜器是以中原地区铜器风格为基础,加入了楚文化的影响:如莲鹤方壶盖上的莲瓣是中原地区的特点,壶顶的仙鹤是新加入的风格;蟠龙方壶承托器身的吐舌兽足是楚文化的特征^[40]。2012年张昌平在《以曾侯乙墓为中心的曾国青铜器研究》中认为曾国青铜器是通过周式青铜器因素进行重组来完成的,从春秋中期开始由周文化特征转为从属于楚文化的特征^[41]。2015年高崇文在《江汉地区青铜礼制文化的发展与传播》中认为,楚国青铜器到春秋中期以后,逐渐形成楚系青铜文化体系,战国时期楚系青铜器占据长江以南大部分区域^[42]。

2. 身份考证研究

通过青铜器铭文考证器物主人或者墓主人身份,

在东周青铜礼器研究中比较普遍。如对新郑郑公大墓出土的王子婴次铜炉铭文的研究,1924年王国维^[43]、1930年郭沫若^[44]、1932年徐中舒^[45]、1940年关百益^[46]、1965年郭宝钧^[47]、1979年俞伟超^[48]、2001年李学勤^[49]等认为“婴次”的身份有楚令尹婴齐、郑国国君子婴等,而郑公大墓的墓主则存在郑子婴、郑厉公、郑成公、郑简公、郑灵公、郑僖公六种可能。1956年郭沫若^[50]、陈梦家^[51]等根据寿县蔡侯墓出土青铜器考证其墓主有蔡声侯、蔡昭侯、蔡平侯和蔡成侯等。依据青铜器铭文等信息,1980年张剑、赵世刚认为淅川下寺楚墓M2的墓主为楚令尹子庚^[52];2004年曹桂岑认为淅川和尚岭M1墓主为楚国高级贵族克黄,M2为其夫人仲姬^[53]。2012年张昌平认为曾侯乙墓青铜器刻铭显示器主与原来铸造的器主并不一致,暗示这些青铜器原来并非都是曾侯乙所有^[54]。

3. 铸造技术和工艺研究

通过对器物自身留存痕迹的考察判断器物的铸造技术,并由此探讨青铜器技术和工艺的成就。1991年赵世刚在《淅川下寺春秋楚墓青铜器铸造工艺》中认为下寺楚墓铜禁、铜盂、铜壶采用了失蜡法,错金是春秋时期青铜工艺方面出现的新技术^[55]。2004年黄克映、李京华在《淅川和尚岭、徐家岭楚墓青铜器铸造技术》中通过对青铜器上遗留的痕迹的观察判断青铜器的铸造方法,认为凡是带有耳、钮、足及其他附件的青铜器,均采用器身与附件分开的分铸法,再以铸接法、补铸法或焊接法将附件组合到器身上^[56]。2008年董亚巍等在《再探曾侯乙尊盘的铸造工艺》中,认为曾侯乙墓尊盘并无失蜡法铸造的任何痕迹,应是传统范铸工艺完成^[57]。

4. 青铜礼器制度研究

尽管东周时期礼制走向崩坏,但青铜礼器制度研究仍然是重点内容。1978—1979年俞伟超和高明在《周代用鼎制度研究》中认为周代各级贵族用鼎制度是以升鼎,即正鼎为中心,镬鼎是贵族在祭祀、宴飨时煮牲肉、鱼腊的炊具;西周前期就已经形成了完整的用鼎制度,在西周后期至春秋早期、

春秋中期至战国早期、战国中晚期先后遭受了三次破坏，周代的用鼎制度在战国晚期走向了崩溃^[58]。1991年刘彬徽在《论东周时期用鼎制度中楚制与周制的关系》中认为楚正鼎分为甲乙两型，甲型鼎为在周鼎基础上的创新，以单件组合大小依次递减；乙型鼎为楚地样式，以成对组合大小依次递减；在诸侯王和卿级别的高级贵族墓里甲型正鼎采用周制奇数列鼎^[59]。2006年罗泰（Lothar von Falkenhausen）在《宗子维城：从考古材料的角度看公元前1000至前250年的中国社会》中认为春秋时期楚系贵族墓拥有两套铜器组合，一套为表现地方风格和形制特征“常规组合”，另一套为广泛分布于周文化圈内、形制古老的“特殊组合”，前者在礼仪中具有直接而实际的效用，后者的作用则可能主要是象征性的^[60]。2015年张闻捷在《楚国青铜礼器制度研究》中认为楚国青铜礼制是周文化青铜礼制的一个重要地方类型，铜鼎遵循“今、古式礼器”兼用原则，“古式”是带扉棱附耳无盖鼎，“今式”是

三环钮盖深腹蹄足鼎^[61]。2016年吴十洲在《两周礼器制度研究》中认为春秋战国之际诸侯国礼器制度的“僭越”现象，实际上是各诸侯国内形成的新的礼器制度^[62]。

三、小结

总的看来，既有研究主要集中在青铜器分期断代、区系类型、铸造工艺、礼制、器主身份考证等议题，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果，为两周青铜器及其相关问题的研究奠定了坚实基础。但仍然存在诸多需要解决的问题，兹简要概括如下：第一，从研究对象来看，相较于西周青铜礼器，东周青铜礼器的研究还相对薄弱；第二，从研究方法来看，宏观研究较多，以具体个案入手的微观研究成果较少；第三，从研究思路来看，青铜器与历史结合的研究还很不足，通过青铜礼器揭示器物与器主乃至历史事件之间的关系等问题的研究亟须推进。

注释

- [1] 王国维：《王子婴次炉跋》，《观堂集林》，中华书局，1959年，第899页。
- [2] 郭沫若：《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科学出版社，1982年。
- [3] 吴其昌：《金文历朔疏证》，《燕京学报》1930年第6期。
- [4] Karlgren. Yin and Chou in Chinese Bronzes. The Museum of Far Eastern Antiquities. Bulletin No.8.1936, pp.9-156.
- [5] 陈梦家：《西周铜器断代》，中华书局，2004年，第354页。
- [6] 朱凤瀚：《中国青铜器综论》，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62页。
- [7] 郭宝钧：《商周铜器群综合研究》，文物出版社，1981年，第49页。
- [8] 唐兰：《西周青铜器断代的“康宫”问题》，《考古学报》1962年第1期。
- [9] 李学勤：《西周中期青铜器的重要标尺》，《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1979年第1期。
- [10] 杜迺松：《青铜器的分期与断代》，《故宫博物院院刊》1982年第4期。
- [11] 容庚、张维持：《殷周青铜器通论》，中华书局，2012年，第17页。
- [12] 唐兰：《西周青铜器铭文分代史征》，中华书局，1986年。
- [13] 王世民、陈公柔、张长寿：《西周青铜器分期断代研究》，文物出版社，1999年，第251页。
- [14] 张懋镠：《西周青铜器断代两系说刍议》，《考古学报》2005年第1期。
- [15] 朱凤瀚：《中国青铜器研究综论》，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1327页。
- [16] Karlgren. Yin and Chou in Chinese Bronzes. The Museum of Far Eastern Antiquities. Bulletin No.8.1936, pp.9-156.
- [17] Eleanor von Erdberg Consten. A Terminology of Chinese Bronze Decoration (First Part). Monumenta Serica XVI. 1957, pp.287-314.
- [18] 张光直：《商周青铜器上的动物纹样》，《考古与文物》1981年第2期。
- [19] 刘敦愿：《青铜器装饰纹样的起源与母题研究》，《美术考古与美术文明》，人民美术出版社，2007年，第97页。
- [20] 陈公柔：《殷周青铜器上鸟纹的断代研究》，《考古学报》1984年第3期；张长寿：《殷周青铜器上兽面纹的断代研究》，《考古学报》1990年第2期。

- [21] Jessica Rawson. *Western Zhou Ritual Bronzes from The Arthur M. Sackler Collections*, Harry N Abrams 1995.
- [22] 杨晓能:《另一种古史——青铜器纹饰、图形文字与图像铭文的解读》,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第381页。
- [23] 陈梦家:《海外中国铜器图录》,中华书局,2017年。
- [24] 高崇文:《两周时期铜壶的形态学研究》,《考古类型学的理论与实践》,文物出版社,1989年,第220页。
- [25] 张懋镕:《两周青铜盃研究》,《考古学报》2003年第1期。
- [26] 高西省:《西周铜壶研究》,《西周文明论集》,朝华出版社,2004年,第51页。
- [27] 〔日〕梅原未治:《杞禁の考古学的考察》,東方文化學院京都研究所,1933年。
- [28] Orvar Karlbeck. Anyang moulds. In *Ostasiatiska Samlingarna. Bulletin No.7.1935*, pp.39-60.
- [29] Noel Barnard. *Bronze Casting and Bronze Alloys in Ancient China*. Canberra: A.N.U., 1961 XXIV, p336.
- [30] 苏荣誉:《青铜工艺与青铜风格、年代与产地——论商末周初的牛首饰青铜四耳簪和出戟饰青铜器》,《艺术史研究》第16辑,中山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131页。
- [31] 俞伟超、高明:《周代用鼎制度研究》(中),《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78年第2期。
- [32] 杨宽:《西周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498页。
- [33] 巫鸿:《中国古代艺术与建筑中的“纪念碑性”》,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77页。
- [34] 李峰:《西周的灭亡:中国早期国家的地理和政治危机》,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162页。
- [35] 李峰:《西周的政体:中国早期的官僚制度和国家》,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0年。
- [36] 高崇文:《江汉地区青铜礼制文化的发展与传播》,《古礼足征:礼制文化的考古学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48页。
- [37] 杨文胜:《中原地区两周随葬青铜礼乐器制度研究》,大象出版社,2016年,第199页。
- [38] 高明:《中原地区东周时代青铜礼器研究》,《考古与文物》1981年第2、3、4期。
- [39] 高崇文:《东周楚式鼎形态分析》,《江汉考古》1983年第1期。
- [40] 杨式昭:《春秋楚系青铜器转型风格之研究》,台湾历史博物馆,2005年,第86页。
- [41] 张昌平:《以曾侯乙墓为中心的曾国青铜器研究》,《方国的青铜与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99页。
- [42] 高崇文:《江汉地区青铜礼制文化的发展与传播》,《古礼足征:礼制文化的考古学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54页。
- [43] 王国维:《王子婴次炉跋》,《观堂集林》,中华书局,1959年,第899页。
- [44] 郭沫若:《新郑青铜器之一二考核》,《殷周青铜器铭文研究》,科学出版社,1961年,第115页。
- [45] 徐中舒:《古代狩猎图象考》,《古器物中的古代文化制度》,商务印书馆,2015年,第93页。
- [46] 关百益:《郑家古器图考》,中华书局,1940年。
- [47] 郭宝钧:《商周铜器群综合研究》,文物出版社,1981年,第84页。
- [48] 俞伟超、高明:《周代用鼎制度研究》(下),《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79年第1期。
- [49] 李学勤:《春秋郑器与兵方壶论释》,《松辽学刊》2001年第5期。
- [50] 郭沫若:《由寿县蔡器论到蔡墓的年代》,《考古学报》1956年第1期。
- [51] 陈梦家:《寿县蔡侯墓铜器》,《考古学报》1956年第2期。
- [52] 河南省丹江库区文物发掘队:《河南省淅川下寺春秋楚墓》,《文物》1980年第10期。
- [53]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南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淅川县博物馆:《淅川和尚岭与徐家岭楚墓》,大象出版社,2004年,第120页。
- [54] 张昌平:《以曾侯乙墓为中心的曾国青铜器研究》,《方国的青铜与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00页。
- [55] 赵世刚:《淅川下寺春秋楚墓青铜器铸造工艺》,《淅川下寺春秋楚墓》,文物出版社,1991年,第387页。
- [56] 黄克映、李京华:《淅川和尚岭、徐家岭楚墓青铜器铸造技术》,《淅川和尚岭与徐家岭楚墓》,大象出版社,2004年,第389页。
- [57] 董亚巍:《再探曾侯乙尊盘的铸造工艺》,《中原文物》2008年第1期。
- [58] 俞伟超、高明:《周代用鼎制度研究》(下),《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79年第1期。
- [59] 刘彬微:《论东周时期用鼎制度中楚制与周制的关系》,《中原文物》1991年第2期。
- [60] 罗泰:《宗子维城:从考古材料的角度看公元前1000至前250年的中国社会》,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第371页。
- [61] 张闻捷:《楚国青铜礼器制度研究》,厦门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63页。
- [62] 吴十洲:《两周礼器制度研究》,商务印书馆,2016年,第401页。